

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与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

丁堡骏

在经济思想史上,人们往往因为强调魁奈的《经济表》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形成上的贡献,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及马克思对它的批判性研究。事实上,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的批判性研究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理论遗产。它对我们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斯密教条阻塞了亚当·斯密宏观经济分析的道路

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道路上比其前辈退步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某些方面亚当·斯密重犯了重农学派的错误。例如,为了证明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资本家生产出了更大的价值,亚当·斯密把牲畜、自然的劳动与人类劳动相提并论,进而把地租归结为农业家使用自然力的产物;第二,亚当·斯密在将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加工成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里进步之处在于“资本”这个名词,他使资本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把资本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的情况。退步之处在于他把“固定”和“流动”理解为决定性的区别,进而混淆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与生产资本、流通资本的界限。

阻碍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道路上前进的是斯密教条。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六章中说:“无论什么产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

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分开来说,每一件产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①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商品价值由 $V + M$ 构成的这一理论称为“斯密教条”。亚当·斯密以谷物价格为例。谷物价格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是付给生产上雇佣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是付给农业家的利润。那么,为什么没有作为不变资本的耕畜和农具等消耗的补偿呢?亚当·斯密解释道,“也许有人认为,农业家资本的补充,即耕畜或他种农具消耗的补充,应当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农业上一切用具的价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就耕马说,就是饲马土地的地租,牧马劳动的工资,再加上农业家垫付地租和工资的资本的利润。因此在谷物价格中,虽必须以一部分支付耕马的代价及其维持费,但其全部价格仍直接或最后由地租、劳动及利润这三部分组成。”^②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在论证谷物价格由 $V + M$ 构成时,他没有直接以要论证的结论为前提,而是承认谷物价格不仅由 $V + M$ 构成,而且还由生产谷物时的生产资料的耗费来构成。但是,他在考察谷物的生产资料例如耕马的价格时,却武断地假定耕马的价格由 $V + M$ 构成。事实上耕马价格为什么

仅由 $V + M$ 构成,而不包括生产耕马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为什么仅由 $V + M$ 构成,而不包括生产谷物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如耕马的价格,是同一个需要亚当·斯密证明的命题。难怪马克思说亚当·斯密是用从本丢推给彼拉多的方法重复同一个命题。

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所犯的上述错误来源于他微观经济分析基础的薄弱。在微观经济分析中,亚当·斯密由于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使他不能科学地说明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是怎样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他是用雇佣工人加入劳动对象中去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价值的。这一微观经济分析中的错误反映在宏观经济分析上,他混淆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

斯密教条使亚当·斯密看不到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严重地阻碍了他宏观经济分析的道路。亚当·斯密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任何成就的获得都是以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他自己的教条为前提的。

(二) 亚当·斯密突破了自己的教条在宏观经济分析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斯密教条将社会年产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收入虽然是要用于个人消费的,因此,全部年产品都要被消费掉。这是由斯密教条所推导出的一个必然结论。这一结论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亚当·斯密拒绝这一结论。为了回避矛盾,亚当·斯密又不得不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把“第四个组成部分”引了进来。他说:“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换言之,所谓纯收入,乃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这种资财,或留供目前的消费,或用来购置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品等等。”^[8]因为纯收入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

所以,个人的产品从而社会年产品,都有一个价值部分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利润和地租,而只分解为资本。这里亚当·斯密已经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教条。正因为亚当·斯密放弃了自己的教条,因而在宏观经济分析上才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谈到固定资本再生产时,亚当·斯密说:“很明显,补充固定资本的费用,决不能算在社会纯收入之内。……这种修茸所必要的材料,以及把这种种材料制为成品所需要的劳动产品,也都不能算作社会上的纯收入。固然,这种劳动的价格,也许会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此种劳动的工人,可能要把工资的全部价值作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就别种劳动说,那就不仅劳动的价格归入这种资财,而且劳动的产品,也归入这种资财”^[9]。在这里,亚当·斯密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亚当·斯密已经认识到,在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和工资总额相等。第一类工人以货币工资形式取得这部分价值,形成他们的收入。但这部分价值的实物形态却是不能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即生产资料。当然,亚当·斯密还不了解,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以利润和地租范畴下存在的那部分价值的情形也类似。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构成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但它的实物形态却是不能供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目前消费的资财。亚当·斯密更没有认识到,在第一类工人的产品价值中,有一部分和这个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不仅由于它借以存在的实物形态,而且也由于它的资本职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形成“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类工人,亚当·斯密只是说,在这种工人的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二者都直接归入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不过第二

类工人产品的一部分与劳动的价格相适应,是留供工人目前消费的资财,产品的另一部分是留供第二类资本家目前消费的资财。

在考察流动资本的补偿时,亚当·斯密说:“社会流动资本便与个人流动资本不同。个人的流动资本,决不能算作个人的纯收入;个人的纯收入全由他的利润构成。但社会流动资本,虽由社会内各个人的流动资本合成,但不能因此便说社会流动资本绝对不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商店内存的货物,虽然不是商人自己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可以是别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由别种财源取得收入的他人,可经常以该收入补还商人的货物的价值,以及偿付商人的利润。商人的资本不会减损,享用者的资本亦不会减损。”^⑤亚当·斯密在这里将作流动资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每年生产的、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第二类工人的商品资本中补偿C的部分,尽管对单个资本家来看不能形成他的收入,但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仍然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在抛弃他的教条,已经指出:社会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即生产资料)的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即消费资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马克思高度评价亚当·斯密的这一贡献,认为亚当·斯密已经接近了宏观经济问题的实质。而且马克思还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亚当·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和现在在考察他称之为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断综合起来他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亚当·斯密的分析达到了这一步,那末,离全部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差无几了。”^⑥然而,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值构成的正确观点不断地和他在广

度上占优势的教条纠缠在一起,所以,亚当·斯密并没有对他的有关思想片断加以综合,他继续迷失在混乱之中。

二、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

马克思在考察了亚当·斯密以后的几位经济学家之后,不无感慨地得出结论说,“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这是1870年后的情况,那末,时隔100多年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它直接涉及到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评价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问题。

(一)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承袭了斯密教条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六章开篇说到:“在全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它表示一国产出的总价值。”^⑦接着萨缪尔森给出了不包括政府和投资因素在内的宏观经济运行图如下:

结合此图,萨缪尔森提出国民产值的两种衡量方法:产品流动法和所得或成本法。所

谓的产品流动法就是从环形上部来看,家庭要用收入购买每年企业所生产出来的最终物品和劳务。从这个观点看,“国民总产值被定义为该国生产的最终产品流量的货币价值。”所谓的“所得或成本法”就是从环形下部看产品成本的年流量。从这个第二种观点看,“国民生产总值也可以被定义为生产要素的所得(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这些所得是生产社会最终物品的成本。”萨缪尔森认为,这两种方法是等同的。^⑧就是说,社会年产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要素的所得(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总和。这不正是斯密教条吗?

现在我们来看萨缪尔森是如何论证他所继承的斯密教条的。萨缪尔森说,“以理发师为例很容易看清这种一致性。在这个例子中假定他没有开支。如果他以单价\$ 6 售出 10 次理发,那么他创造的 GNP 是\$ 60。而他的所得(不是工资就是利润)也正好是\$ 60,因此,不管用环形上部(\$ 60 理发)还是用环形下部(\$ 60 工资和利润)来衡量,他这部分 GNP 的价值都是一样的。”^⑨前面我们在考察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时,我们看到,亚当·斯密在论证谷物价值只分解为 $V + m$ 时,首先假定谷物价值中存在“第四个组成部分”,然后在为谷物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如耕马的生产部门假定耕马价值不包括“第四个组成部分”。萨缪尔森抛弃了亚当·斯密的这套从本丢推到彼拉多的方法。要证明理发只分解为 $V + m$, 萨缪尔森不兜圈子,直接假定理发没有开支。萨缪尔森把未知当已知,我们不能不钦佩他的理论勇气。至于萨缪尔森所说的,把利润定义为余额成本,就能使环形下部的成本或所得与环形上部的物品价值正好相等。这一套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环形下部成本或所得与环形上部的物品价值是否相等,不在于利润项,而在于不变资本或斯密所说的“第四个组成部分”。

再看一下萨缪尔森为了避免国民总产值

重复计算而采用的“加入价值方法”,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萨缪尔森和亚当·斯密一样,在微观经济分析中没有劳动二重性学说,不能科学地说明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进行的。这一微观经济中的理论缺陷反映到宏观经济分析中就是混淆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

通过以上我们对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内容的考察,我们看到:亚当·斯密的混乱思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斯密教条仍然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二)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突破斯密教条的企图及其失败

萨缪尔森在承袭斯密教条,将社会的收入和社会生产的总价值相等之后,企图利用总投资和净投资与国民总产值和国民净产值的概念区别,把“第四个组成部分”引进来。

萨缪尔森意识到,只谈需要消费面包、苹果、柑橘和理发的人们是很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国家还要用一部分产出来生产新的资本品,因此必须分析投资。关于投资,萨缪尔森强调投资是资本形成,“是由一国建筑、设备和存货存量的增加部分构成的。它是在一年内生产的新的房屋、工厂、卡车和存货”。¹⁰那么,为什么要在投资前面加上一个“总”字呢?萨缪尔森解释说,“统计工作者使用这个字是要指出,他们还没有扣除资本的消耗,即没有扣除资本的折旧。”因此,“净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折旧。”

对萨缪尔森的总投资和净投资的划分,我们评论如下:第一、萨缪尔森将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部分直接等同于资本,抹杀了资本范畴的历史性;第二,萨缪尔森既不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不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因此,他把投资片面地理解为固定资本投资。即便是他的总投资概念也不包括投资构成要素中的流动资本部分。

考虑到人们把一部分社会生产可能用于

投资的情形,萨缪尔森修改了原先的国民总产值的定义。“国民总产值是一切最终产品的总和。除消费品和劳务外,我们还必须计入总投资。”^②在谈到怎样通过国民总产值不计算国民净产值时,萨缪尔森说,“国民总产值(GNP)被定义为最终产品的总和:它包括消费品和加总投资(和我们将看到的政府购买)。国民净产值只包括消费、政府购买加净投资。”^③萨缪尔森强调,总投资能够相当精确地被估计出来,而不需要难于估计的折旧数字。因此,各国政府一般都主要依据国民总产值而不是国民净产值。

我们认为,即便是就国民总产值而言,萨缪尔森仍没有将“第四个组成部分”全部引进来。国民总产值与国民净产值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包括折旧部分。因此,萨缪尔森通过国民总产值与国民净产值的区别而引进的至多不过是“第四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价值)中的固定资本损耗部分,不变资本价值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即流动不变资本部分,仍被排除在国民总产值之外。可见,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派的宏观经济学突破斯密教条的企图已宣告破产。由此决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奠定在国民总产值理论基础之上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是缺乏科学基础的。相应地,两部门经济中的 $I = S$ (即投资等于储蓄)、三部门经济中的 $I + G = S + T$ (即投资和政府支出的总和等于储蓄和税收的总和)以及四部门经济中的 $I + G + X = S + T + M$ 或 $(T - S) = (T - G) + (M - X)$ (即投资储蓄差额=政府收支差额+进出口差额),这些均衡条件也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不仅如此,更为不幸的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派宏观经济学比亚当·斯密更退一步,彻底地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如前所述,亚当·斯密从劳动创造价值出发,已经触及到了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的划分,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两大类划分及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理论奠定了理

论基础。相反,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毫无作为。事实上,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用来说明结构平衡的存货调整理论不过是庸俗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其理论体系而言,较亚当·斯密的宏观经济分析也是一个很大的退步。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仍然是庸俗经济学。因此,如果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的概念和方法能够被我们借鉴和吸收,那么,这也必须是在批判和抛弃它的庸俗体系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成功。近年来西方宏观经济学大搬家的事情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著作中屡见不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然而,理论上的是非混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与我们理论工作者没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往往是从时代背景和方法论方面谈论的较多,而从理论内容方面正面批判的较少。抽象议论较多,具体分析较少。人们对西方经济学渐渐地采取了一种不负责的态度:在口头上将西方经济学骂得狗血喷头,而在实践中却照抄照搬。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运用这一理论去分析批判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科学成分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注释:

①②③④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6~47、45、262、262、26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7~409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卷,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6、177、182、183、182、184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